0

在一年前的上一篇回顾中，我说我的人生道路是由三个关键瞬间的各一个选择，以及我作为生物而具有的路径依赖的本能组成。现在回想起来，这一理论框架似乎也预言了我这一年，以至可能是之后的一生。只不过它需要稍作修改：2018年4月填写专业志愿的那个瞬间的影响至少与前三个瞬间中的后两个持平，它也应该加入这个列表。

本文内容与其标题的直观意义并不相符：它不是对这一年的记录，而是基于我这一年中观点的变化而对整个过去的重新审视。

本文是一篇目标读者为我自己的虚构类文学作品，对于其中的任何部分不宜较真。

1

从许多种意义上讲，对我影响最深的城市是香港而不是武汉或上海。

在多件与这座城市有关的事件之中，最重要的那一件自是2012年暑假的那次已被我在多个场合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叙述过的偶遇。仔细回想起来，那一次参赛经历除去那次偶遇对我的影响之外，无疑也改变了我生命在通常意义上的路径。如果不是IMAS的那一次获奖，仅仅手握三四个一等而又无华杯的我大概很难进入华源8班。即使碰巧进入，也肯定不会得到老师的特别关注，而这份关注对那时的我影响属实不小。如果初中没参加联赛，也就无法得到某机构的推优，自然也会去到一个不同的高中班级。而后的故事也就与现在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

当然，前MO选手这一身份虽然值得作为我给自己的定义中的一部分，但无疑是地位比较靠后的那部分。而这座城市与我的第二次交集，在我除去了这一层身份之后，似乎更接近于真实的我与这个世界的接触。

我在进入大学前参观过的四座中国城市的8所大学里，CUHK毫无疑问地给我最好的印象。以10为满分的话，这个优势大致相当于7个4-9分不等的评价里的一个20分。很难公平地评论这个分数中周保松老师个人的影响占了多大比例，但正如我们总是很难分清对一件事物的感情中各个影响因子各占了多少。但年少之人的决定正如他的心情一般是冲动而无定数的，在十八岁的冬天遭遇的理想的侧影总是令人难以拒绝。

按理说高三寒假不该有时间在面试之外参观另一座城市，对高考备考时间算上寒假一共也就只有7个多月的我更是如此。但那根本不是参观一座城市，从某种意义上，甚至更像是这座城市在参观我。是它在看着那个小男孩，在经历了这些、那些和那些之后，他成为了一个怎样的人；那颗种子的播种人虽已无处寻觅，但它长出的树苗确已不再需要园丁。

三天的时间我只去了三个校园和两家书店，这怎么也不像一个旅行计划。但坐在香港最繁华闹市区中一栋破楼的高层某个角落的窗边，望着每个城市都存在着的商业街和人群，我面前的竖版繁体《政治的道德》和窗外的繁华至少一样伟大。

它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少有人会真心实意地觉得自己在精神层面渺小，而我面前的那本书，以及在高三逃课去另一个城市看书的我，恰代表着自己思绪最真实的的影子。

“Sorry, political signals are not allowed on our campus.”

2

去年我说，如果让我给自己写一篇自传，那么2012年夏天的那个午后是唯一值得被写入的事件，因为之后的事情都是这个仅包含一个元素的公理集的直接推论。

在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似乎还有什么不完整。没错，哪怕是仅存在于理论中的最简化版数学教科书，除去给定的公理集，也至少该有一个例子才对。

二零一八年九月九日早上十点二十五分左右，我在全体大一同学正在开学典礼上起立宣誓时，面对着正在航拍我院方阵的遥控航拍机器人，径直从会场中走了出去。

不可能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

事情固然可能像是我所声称的那种叙事一样，只是单纯出于对集体宣誓这种活动形式具有刻入骨髓的反感，而不论其内容、场合，或对象。但拒绝参与集体宣誓有无数种方法，在正在被航拍时径直走出去显然不是最好的一种。总有更温和的方式，比如在全体起立时依然坐着玩手机，像我在高中成人礼的高考誓师大会上的做法那样；在所有人敬礼宣誓时只是笔直站着，像我在更久以前时的选择那样；假装敬礼但是一句话不说，像我旁边的一部分同学那样；又或者是照做但并不认同其中的内容，像我旁边的另一部分同学那样。

在那之后的一年里，我许多次思考过我那一瞬间的决定，我逐渐倾向于否定这种做法是出于我对集体宣誓这种行为的格外反感。反感是我不认真宣誓的理由，但不是我在开学典礼上从全校同学面前走出去的理由。

是的，我知道我所指的是什么。

3

有两件事的因果关系我一直无法判断：到底是因为我本就天性拒绝集体，因而才一再成为集体中的异类；还是若干次巧合中我碰巧都是集体中的异类，然后在屡次被孤立的心境中形成了拒绝集体的价值判准？

毫无疑问，这两者最终必然会形成互为因果的正反馈循环，似乎探究何者在前对理解自身没有意义。但又不是这样。我曾经倾向于、并试图证明是前者，就像每个中二少年总是想证明自己生而不凡。后来我发现，如果我能证明是后者，才对我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粗略一想似乎前者代表自由意志而后者接近于环境决定论，但事情可能恰恰相反。

据说科学哲学要求一个可靠而合理的命题达到“合理的真信念”标准，即：必须有人相信它，这种相信出于某种合理的理由或论据，最后这个命题在客观宇宙是真的。比如最简单的“我相信我的表此刻是准的，因为它质量很高并且一贯是准的，最后它确实也是准的。”

为了使我证明我的这个信念是可靠的，它必须出于合理的理由。如果鸡生蛋的问题被证明是前者，信念的合理性就会因为其成立性的范围而立即崩溃。

4

裸考654分在2018年的湖北省排在2007名，这既不能考上贵校录取线最低的提前批专业，又不能在我省任一985高校选择我现在所学的专业。

当然人总是可以给自己找无数个客观理由。七个半月的训练怎么看也不够充分，几次模考的连续超高分可能不过是我高三过分针对考试特别是周练而学习，对学校老师命题风格模型overfit的结果；数学和物理压轴题简单到值得我写出个人知乎最高赞单篇来吐槽，致使整体分数偏高；当年化学生物填空简答评分玄学，理综比估分低上十来分，至少在我校高分层是相当普遍的抱怨。

但那晚两点半刷出分数的我却是相当之平静的。这种体验就像一种解脱：如果再高那么几分到十几分到二十分，我将面对另外三个可选项。它们每一个看起来都有其诱人之处，但也都面对着更高的未知风险。我很难判断我会不会选择它们，但那种选择的煎熬至少已经与我无关了。被迫接受最后保底的选项看似无可奈何，但也似乎是我早就有预料的结果。追寻第一选择失手后以大幅度的盈余落入最终备选项，似乎是我整个生命的一贯状态。

那晚的我意外地平静，大约是生命里第二次经历这种平静吧。完全是预料之内地，似乎更好但又充满未知的选项以莫名其妙地方式失去。某种程度上我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幸运，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像那天的三年半以前那个雨夜里一样拒绝另外的选择。不，不是不知道，是肯定没有。对那一刻的我，个人发展之外的因素显然已经足以直接替我做出那个决定。

这整件事就像一场梦：一方面，17年11月刚回校周练四百多分的我当然很难相信我最后能把654分称作发挥失常。而另一方面，模考的那一次比一次高的高分是梦境中的景色：除了用于支撑自己走完这段路之外与现实没有任何交集。最后的选择似乎是失常又似乎是超常，正如以往许多次评估一样，我对自己最好和最差的想象的差值小于测量仪器的不确定度区间范围，因而读数结果对我的自我认知在统计学上没有任何参考价值。